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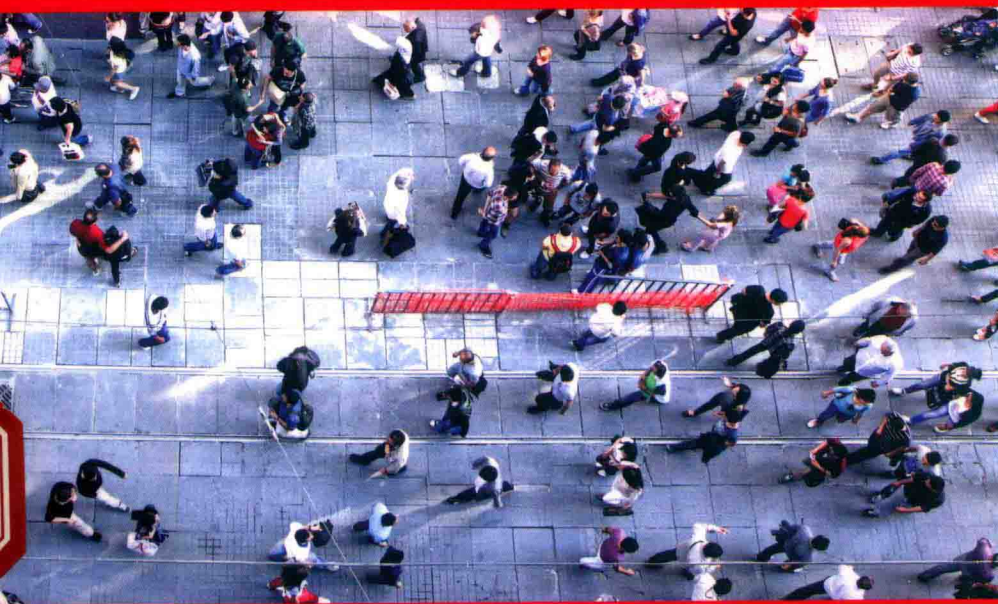
女性、性别与研究

中国与北欧视角

Women,
Gender and Research

Chinese and Nordic Perspectives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Bettina Hauge 王繁璨 ©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女性、性别与研究

中国与北欧视角

Women,
Gender and Research
Chinese and Nordic Perspectives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Bettina Hauge 王璨璨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性别与研究：中国与北欧视角/王粲璨等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8. 1

ISBN 978 - 7 - 5426 - 6136 - 4

I. ①女… II. ①王… III. ①妇女学—对比研究—中国、北
欧 IV. ①C913.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2968 号

女性、性别与研究：中国与北欧视角

主 编 / 王粲璨 等

责任编辑 / 杜 鹃

特约编辑 / 周治华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 - 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5.8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6136 - 4/C · 568

定 价 / 39.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510725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1.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Bettina Hauge, 王粲璨
性别动态学：中国、丹麦和北欧视角 / 3

全球集合

2. Nina Trige Andersen
“我不是搞理论的，我做的是概念工作”
——Aihwa Ong 访谈 / 19
3. Cecilia Nathansen Milwertz
死亡与我的 iPad——中国工人与北欧/中国消费者的全球集合
/ 33

家庭, 主体性与实践

4. Michala Hvidt Breengaard
中国城市中的育儿实践——在北京做一个称职的母亲 / 47
5. Anna Sofie Bach
在必须与乐意为之间——浅谈双收入/双职工夫妻中的父职 / 67

福利制度

6. Peter Abrahamsson

丹麦和中国视角下的性别和福利制度调整 / 91

流动性可持续性 with 消费主义

7.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汽车文化的诱惑

——中国 21 世纪汽车文化的性别、阶层和国家 / 113

8. Nikolaj Vendelbo Blichfeldt

中国城市退休人员低碳生活的性别差异 / 133

9. Hanne Petersen

新自由主义后的秩序重构？中欧交流中的“增长迷恋”、
性别与环境 / 149

书 评

10. Leta Hong Fincher (王粲璨评论)

读《剩女》有感——从婚姻和房地产财富看中国性别平等
现状 / 169

11. Elisabeth Engebretsen (包宏伟评论)

在中国酷儿群体中社会规范协调 / 174

12. Jung Chang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评论)

慈禧——“中国唯一的男性” / 178

13. Nancy Fraser (Birte Siim 评论)

再思性别正义：跨国研究 / 182

序言

性别动态学：中国、丹麦和北欧视角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Bettina Hauge, 王粲璨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博士, 社会学系副教授, 性别研究中心主任, 哥本哈根大学, 哥本哈根。

Bettina Hauge, 博士, 前丹麦科技大学副教授, 现任丹麦创新基金会,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投资经理。

王粲璨, 博士, 数字化管理系, 哥本哈根商学院, 腓特烈斯堡。

一百多年来,以《夜莺》为代表的安徒生童话在中国和丹麦广受读者的喜爱,与其对应的一套价值与观念也应运而生,将两国读者联系起来。在中国和丹麦,社会公平都是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安徒生童话使用诗歌、讽刺、幽默等手法强调了公平的社会价值观,贯穿整个 20 世纪,童话将这个东方的广袤王国和欧洲北陆的小王国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片想象中的社区(安徒生,1983)。安徒生眼中的中国是一片盛产陶瓷的美丽土地,他笔下的丹麦则是一个宁和静谧的世外港湾。然而在这两件华丽的外袍之下,两国的土地上仍然弥漫着不守规则与不公正的社会状态。安徒生曾说,两国社会都需要伦理和道德上的指引。一个多世纪以来,安徒生的童话为这两个地区的价值体系与道德标准的建立做出了许多贡献,时至今日,丑小鸭与夜莺仍是备受读者喜爱的童话形象。这些童话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不公平与社会等级分化此类的恶是有法可解的,这些问题的

解决同时也会带来社会转型的希望。^①

迈入 21 世纪之后,尽管中国与丹麦在多样的全球融合背景下各有应对,但两国在一些方面依然表现出神奇的共性。首先,两国都身处转型之中,其主要表现为新型的市场合作、产品与消费的全球配给,以及在以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 WTO 等)为代表的新兴管理架构下的发展。此外,两国在性别平等议题上也都有卓尔不群的表现:就政治层面而言,自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于北京提出性别议题后,两国都各自签署了多个有关该问题的国际协议。由此看来,性别问题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平等战略,要求世界各国在一切公共物资供给以及其他更广泛的现代化建设项目中将性别与平等正式地整合起来。

《女性、性别与研究》一书从中国、丹麦和北欧等不同的视角出发,通过收录多个社会领域的前沿研究,为性别与平等问题寻求解决方法。收录文章不仅涵盖家庭、福利和平等领域的新老问题,同时涉及消费主义以及可持续性等新话题,还就当下的全球研究与比较研究提出了研究方法上的见解。本书通过结合多家观点,连通比较,填补了性别与社会研究领域的空白;并将性别动态学视为北欧和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重点研究了中国与丹麦的城市文化中新兴的性别动态问题,其中多篇文章探讨了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检视了性别对于打破旧的集体主义、进行新的自我实践的影响。在东西文明混合交融的现代社会中,中国和丹麦都试图真正地将性别动态发展整合到联通东西的现代化建设项目中,而正是这样的尝试,建立起两国之间的又一层纽带关系。

^① 安徒生的童话最开始在 1914 年和 1918 年被翻译成中文。自此,他的童话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在毛时代,安徒生童话变得更加广为流传(Guo, 1993)。

连通比较与多元现代性

在本书中,许多文章都提出了全球现代性和连通性等复杂概念,反过来,这些概念也要求我们对实验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途径进行反思。连通比较(connecting comparison)这一概念在东西方性别现代性的历史分析中极具说服力,它“既非将特殊的现象视作某种抽象‘规范’的衍生品,也不根据必然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inevitable modernization)的假定来衡量此种发展”(Weinbaum 等, 2008: 4)。连通比较主要是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方法,它强调现代性时间轴是横向的、同步的,而非演进的或静态的。该方法重点关注不同的地方进程如何互为条件,并影响彼此发展,以此对现代性等抽象类型学提出了挑战。

现代性一词主要是指现代社会中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的融合。到目前为止,现代性主要与西方的发展相关联,也因此被视作一种来自西方的独特文化与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公民表达自我、向国家要求权利的西方民主的理想形式,已经成为了现代性的一大特点(Habermas 1962/1989; Calhoun 1992)。① 此外,现代性也常被追捧为一种对现代城市生活中新鲜且具都市感的事物的认知。历史分析显示,在 19 世纪晚期、20 世纪早期的时候,男性资本家这一群体(外加一些女性)尤其都得益于这些理想。他(她)们通过新

① 我们采用现代性(modernity)一词以及其更近期的解释,而非其他相关的如全球化、资本主义或现代化等术语。现代性包含有时间上和概念上的双重维度,正如 1864 年法国诗人鲍德里亚(Baudelaire)在生造此词时给出的著名定义:“所谓现代性,我指的是转瞬即逝、疏忽不定、随机而变。”(Delanty 2007)针对都市现代性的纯粹轨迹的探索仍很盛行。见刊于《休战时期的艺术和设计(Art and Design between the Wars)》中《上海风格(Shanghai Style)》一文,作者 Lynn Pan,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

的公共城市生活来解放自我,无论是在教育、艺术、文化,还是在政治领域,享受着从这些束缚与限制中片刻逃离的可能性。同时,公共领域这一主流概念作为现代性的重要领域,试图将家与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放在现代性的“另一面”。这种概念区分对 20 世纪的东西方女权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二者均认为家庭生活以及母亲的身份妨碍了女性的解放,私人家庭也成为了女性争取平等之路上的一个结构性的绊脚石(Winther 2006; Christensen 2009)。^① 这种有关家庭和母亲身份的批判得到了 20 世纪法西斯思想和实践的助力,其中也包括曾引发了严重歧视行为的保守性别观念。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这种公私领域的二分论被引入社会学研究,使得家(home)、家庭(family)以及家庭生活(family life)在社会与城市现代化的研究中被边缘化。^②

尽管中国被普遍看作最近才显现现代性的后发国家,但关于全球化的最新讨论和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实际可追溯至一个时间跨度更久、也更为复杂的过程的一部分。根据华裔美国文学学者 Lu Sheldon 的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从 19 世纪中期一直延续至 21 世纪,并在其初期表现出了一系列连续的或是重叠的“现

① 这更接近比如 Mohanty(1984)的后殖民主义批判。Mohanty 对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批判主要在于其边缘化家庭与家庭生活。

② 这是另外一个放大角色分离以及对家庭和家庭生活的狂热的熟悉的策略。它在 20 世纪的前半段作为东西方帝国维持稳定的策略之一而被发展起来。西方和东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女性将此看作是通向生活与工作平等的捷径。见《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务劳动与现代中国的形成(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作者 Helen. M. Schneider, 出版社 UBC Press, Vancouver, Toronto, 2011 年。最近的学者从文化现象学的角度将家庭的概念重新引入到社会学中。见刊于《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中《家的理解:对文献的批判性回顾(Understanding Home: A Critical Review of Literature)》一文,作者 Shalley Mallet,出版社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第 63-88 页,2004 年。以及《家庭(Home)》一书,作者 Alison Blunt,出版社 Routledge, 2006 年。

代”时刻(Sheldon 2007: 1)。例如1900年前后慈禧太后时代所表现出的晚清现代性开端(请参见本书的书评部分)。此外,还有在这之后的民国时期,以及从2011年起中国沿海城市中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现代性,这些现象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的家庭形式、婚姻、女性教育与母亲身份的讨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到60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代性中,有关母亲身份和家庭生活的话题几乎在公众议题里消失了(Hershatter 2004; Ko & Wang 2007)。在马克思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中,家庭之外的生产工作中的女性的平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这也削弱了公共话题中家庭和家庭生活的相关性。因此,尽管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代性差别迥异,但通过这种跨国界与区域的比较,家庭和家庭生活无论在社会结构还是意识形态上都被边缘化了。

同时,受到其他现代现象的刺激(如全球不断发展增加的信息交流、世界各地人们的流动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当下处于现代性晚期的西方以及处于后社会主义现代性期间的中国均显现出了新的规范和社会形态。身处当今的全球社会,获取规范与社会形态的最佳途径便是了解与现代性和全球交互理论相关的概念。在新的全球背景下,面对复杂、抽象、易变且动态的现象,我们该如何进行研究? Collier 和 Ong 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新型社会和全球集合(the new social and global assemblages)”的概念(Collier & Ong 2005; Zhang & Ong 2008)。尽管连通比较在经验主义和基于实证的分析中非常实用,但全球集合这一概念通过与现代性以及全球交互(global interfaces)的理论相进行具体关联,将实证分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全球集合与新型社会

在本书的开篇访谈中,华裔美国人类学家 Aihwa Ong 表示,当处理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采用的应当是大胆的分析概念,而非包罗万象的庞大理论。据 Ong 所言,全球集合由不同而分散的元素构架而成,通过这些元素的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空間。这些元素的相互作用具象化了那些促成可能的状况与结果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遵循既有模型下的给定公式或是脚本(Zhang and Ong 2008: 10)。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全球集合的概念其实与众所周知的(由英国社会学家 Anthony Giddens[安东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生活政治和后传统社会的概念有相似之处。^①

全球集合这一复杂的概念具有一个独特的“全球”特质,它特指那些有吸引力的、易变的和动态的交互现象。同时,这些现象也超越了分析的边界,有助于重构已知,或是想象出的“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形态。在组成全球集合的各个过程中,全球形态要么处于特定的情境下,要么按地区划分,但也正是如此,它们才能够对新的物质的、集体的和松散的关系进行定义。“这些出现全球集合的领域,往往是个人与集体的形态和价值观,因技术、政治或道德干预而被问题化,或处于危险之中的领域”(Collier & Ong 2005: 12-13)。因此,针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某个单一的现象,或是局限于某种单一的逻辑,而是需要将各种现象混合起来把握(Collier & Ong 2005: 17)。这一概念与现代性的特征相呼应,二者都存在于全

① 根据吉登斯(Giddens)的观点,每天的日常实验渗透到现代体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的肌理。不仅是当地社群,个人生活和自我的私人特点也已经与无限的时空延展的联系交织在了一起。安东尼·吉登斯:《生活于后传统社会》,第58—59页,出现于Ong(2005)第9页的引用。

球现代生活中如影随形的矛盾当中，因此该概念本身就暗含着一种内部的矛盾：“全球”一词有宽广、包容、细密却又易变的含义，而“集合”则显示出事物具有不同的、偶然的、不稳定的、部分的以及分散的特点。

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探讨了微观史，这些小历史以一种“仔细而又有限”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化这样的大问题(Collier & Ong 2005: 12)。这些文章提出的新社会形态(*the New Social*)从某种程度上连接了东方与西方。这种新社会形态由新兴的自治与远程管理的技术组成，是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治理的结果。本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描绘了公众和私人实践与公共干预日益交融的现象，以及个人选择和个人兴趣如何也许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公众话语走向。然而，这些文章不只研究具有干预性与解放性的特征与实践。跟随着 Ong 和 Collier 的步伐，这些作者们也探讨着通过何种方式，她(他)们手中的研究数据如何能够对理解不同地域、时间与瞬间中的“世界形成与未来想象”做出贡献(Collier and Ong 2005: 9)。

本书收录文章

中国的城镇化、社会流动性以及中产阶级的崛起的规模迄今还未得而知，但在这些进程中，新的中产阶级家庭正在成为压缩的现代生活的实验室，在新型社会中创造着新的主观性与实践。本书中，Michala Hvidt Breengaard 在其文章中探讨了在形成新型社会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中，这些现代化进程是如何展开的。Michala Hvidt Breengaard 研究的是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化进程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有能力的母亲身份的形成过程。她的研究重新界定了判断一位母亲是否有能力的标准，并讨论了在媒体与科学的影响下，阶级和代际如何被重新塑造，从而形成新的治理结构。一方面，受过良好

教育的母亲们成为了话题的中心,被视作高能力的代表;而另一方面,老一代的、农村地区的或是居家的母亲则被定义为没有能力。

本书中的另一篇文章则将中国的家庭和性别的案例与丹麦以及北欧地区的参与式父职进行了比较。Anna Sofie Bach 在《在必须与乐意之间——浅谈双收入/双职工夫妻中的父职》一文中,以丹麦事业型家庭中的男性为样本进行了研究。尽管这些男人或父亲看似是北欧平等家庭实践的领跑者,但他们的参与实则出于实用性的动机,也就是他们希望用情感投资来调和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对参与式家长和父职的讨论在中国媒体以及新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非常重要,这篇文章为目前这一讨论贡献出了自己的观点。

家庭实践无论新旧,都是福利安排的制度化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两者都依赖于福利体制中所表现的特定的国家、市场、家庭以及广义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Peter Abrahamsson 在其文章《丹麦和中国视角下的性别和福利制度调整》中描绘了丹麦以及北欧国家详尽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制与公共支持。而中国在后社会主义时期也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随着单位体制的取消,国家出资或公司相关的福利保健机构也随之消失,福利保健变成了家庭以及祖父母一代的个人事宜。虽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两国的福利体制都相差巨大,但两国同样都面临着人口类型转变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两国都有越来越多地需要支持与呵护的老年人。正如 Peter Abrahamsson 所言,中国和丹麦都致力于让公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以及提供普遍性的社会福利。两国似乎都在向一个公私服务结合的福利系统发展,在这种福利体制中,性别与阶级和年龄一道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丹麦学者 Cecilia Milwertz 研究中国女性已有 25 年时间,在《死亡与我的 iPad——中国工人与北欧/中国消费者的全球集合》一文中,她考察了中国工人与北欧和中国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她认

为,应通过全球集合以及内动(intra-action)过程这样的概念来重新确立研究的角度,也就是说,北欧和中国应采用全新的或是共享的方式来定义研究目标,二者之间也应当开展研究合作。

Hilda Rømer Christensen 的《汽车文化的诱惑——中国 21 世纪汽车文化的性别、阶层和国家》一文主要关注性别和汽车这两个概念在全球集合和地方集合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两者在性别、阶级以及国家的新概念中的意义。文章认为,汽车文化可培养躯体知觉、生活方式以及新的道德观,同时,这种文化也代表了与阶级、性别以及地域相关的全新的且至关重要的社会差距。有趣的是,这些在今天汽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消费主义浪费问题,在 Nikolaj Vendelbo Blichfeldt 的《中国城市退休人员低碳生活中的性别差异》一文中则有减轻的迹象。在他的文章中,Nicolaj 描述了低碳活动群体致力于改变日常消费实践,他们通过将一组女性推举为榜样,自下而上地形成了全球集合。在杭州东平巷举办的低碳生活活动,从技术、政治以及道德的角度来看,再度讨论了在改革开放后期以及中国加入到改善全球气候变化的初始阶段——这一历史、政治以及经济交叉点上,成为一名“恰当的公民”的含义。

最后一篇文章则是 Hanne Petersen 所作的《新自由主义后的秩序重构? 中欧交流中的“增长迷恋”、性别与环境》。在这篇文章中,Petersen 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项共同承诺——对增长的迷恋,提出了一个批判性的观点。文章认为,“增长迷恋”使得经济的发展极端化,因此对环境和气候造成了有害的影响。若想可持续地应对这些挑战,则需要转变(性别和环境)秩序、增强对早先传统和“迷恋”的认识、发展与所有这些行为和关系的“所有权”本质相关的全新的概念和看法。集合并分享这些来自不同全球背景中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精神方面(或是这些形式交汇于一体)的经验和实验,可以为中西方的决策提供新的方向、引导性的概念以及未来前进的

方向。

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书评环节,对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进行了批判性和探索性的分析。Leta Hong Fincher 所著的《剩女: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回潮》一书总结了女性和性别平等在改革时代的中国所处的地位。本书从单身女性入手,对当今中国媒体对于(单身)女性的讨论进行了反思。尽管这些女性在教育 and 职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承认,但是由于未婚的生活状态,她们仍被称作“剩女”。书评从这一现象出发,对书中提到的性别期待、家庭暴力以及财产所有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书评部分还收录了《中国城市的酷儿女性》一书。该书从人类学角度对中国大陆女性的同性主体性、亲密关系以及社群进行了研究。人类学家 Elisabeth Engebretsen 在书中提到,许多“拉拉”(即中国女同性恋)渴望过上和异性恋情侣一样的正常生活,并且排斥或否认女同性恋或是同性恋等的类别划分。与此不同的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性向少数派人群会庆祝自己有自由坚持不同的性取向,也会拒绝双重的生活。评论员认为,在当今这个地区和全球进一步交织、超越了国界的世界中,中国的同性恋文化必然与西方的形式不同这类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书评部分的最后则是对《女权主义的命运:从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一书的介绍,作者是知名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 Nancy Fraser。她认为,女权主义者必须放弃与市场的危险同盟,而是应该与其他维护社会凝聚力的社会力量一道结成新的同盟。这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对资本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危险同盟的批判是主要针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吗?现在还存在一个为共同的社会公平而奋斗的女权主义运动吗?还是说当今的女权主义分诸多派别、均对性别平等持有不同的见解?